

【域外走笔】

藤井先生

□ 吕周聚

藤井省三先生是我在东京大学做学术访问时的SPONSER,他是东京大学文学部著名的教授,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,也是海外学界著名的汉学专家。藤井先生个头不高,身材偏瘦,两眼炯炯有神,显得和蔼精干。

藤井先生的父亲在“二战”时期曾被派到中国战场,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,并受到战俘优待,因此对中国人心存愧疚与感念。受父亲的影响,藤井先生从小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他在中学时就开始阅读鲁迅等人的作品,在东京大学读书时选择了中文专业,并于后来到复旦大学留学,因此他的汉语很好,这为他成为“中国通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藤井先生在东京大学上大学时,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丸升山先生是他的老师。丸升山先生主要研究左翼文学,他本身也是一个左翼革命家,上课时给学生讲无产阶级文学论争,对藤井后来从事鲁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藤井先生虽然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成果,如《〈故乡〉阅读史》等,并且在丸升山先生退休后接了他的教职,但他谦虚地认为,自己并不是丸升山的接班人,因此他不像丸升山先生那样是一个左翼革命家。从思想上来讲,藤井先生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。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,他在政治上所支持的那个党派在国

会中也只是少数派。他信奉自由的学术理念,因此,他也没有像他的老师丸升山那样执着于鲁迅、左翼文学研究,而是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与爱好。他除了研究中国大陆文学之外,还对香港文学、台湾文学有着浓郁的兴趣,并在这些研究领域有所收获,出版了《鲁迅事典》《百年间的中国人》《现代中国文化探索——四个城市的故事》《中国文学一百年》《台湾文学这一百年》《中国语圈文学史》等多部学术著作。后来他又对中国的电影产生兴趣,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日本的观众介绍中国的电影,于是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电影评论,后来结集《隔空观影:藤井省三华语电影评论集》出版。

东京大学的学术体制比较自由,对于教师没有严格的考核要求,但藤井先生多年如一日,辛勤耕耘,这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。藤井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工作狂,除了外出开会等之外,他每天5点起床,简单地吃点东西,然后乘地铁从家里到学校,6点以前到办公室。他的家里没有书,书都在办公室里,两间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,甚至地板上、桌子上都摆放着书,书架的中间悬挂着一幅鲁迅先生的照片。他一整天呆在办公室里,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回家,就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休息一下。

藤井先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,他不是靠口头来说,而主要表现在行动上。他的办公室在6楼,为了节省电能,他平常上下楼时不乘电梯,坚持爬楼梯,只有陪同客人的时候才乘坐电梯。他的办公室里虽然有空调,但他从来不开。8月是东京最热的时候,加上他的办公室又朝西,下午太阳照射在办公室的窗子上,室内温度很高。办公楼的走廊里都有空调,非常凉快,我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,一进他的办公室,热浪扑面而来,顿时汗流浃背,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书写东西,手里摇着一把小扇子,不时地用手巾擦汗。他的家里也没装空调,他说他的家在一个山上,山上温度低,凉快。平时上班他不开车,只乘坐地铁和公交车。

藤井先生喜欢喝酒,这在圈里是有名的。他说他年轻时就喜欢喝酒,父亲告诉他不能喝太多,喝多容易误事。他听从父亲的劝告,一天只喝一次。因为下午有事情,他中午不喝酒,到晚上时喝一点,喝到微醺即止。喝完后看会儿电视,有喜欢看的就多看会儿,没有喜欢看的就早休息。每天晚上喝点酒固然是他对酒的嗜好,但喝点酒也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。

藤井先生是一个“美酒家”,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对酒比较挑剔,只喝某种酒或某个牌子的酒。他愿意品尝各种不同的酒。说起中国的酒来,

他对茅台、五粮液非常赞赏,同时对北京二锅头、衡水老白干、青岛琅琊台等地方名酒,也非常欣赏。在东京时,他请我到位于东京大学汤岛附近的一家名叫“信介”的酒店吃饭,他说这家酒店很有名,要提前预订座位才行。这家酒店的菜很精致,味道也很不错。上来的菜我不认识,问他这菜叫什么名字,有的他随口就能说出中文的名字来,有的比较陌生,他便拿出随身携带的电子词典,查了之后告诉我菜的中文名字。他点了一杯啤酒,啤酒口感很好;喝完啤酒,他又要了一种日本清酒,这种清酒是冰的,他说日本好的清酒不要加热,一旦加热之后,味道便会发生变化。说完,他把服务员叫过来,让其把一个添酒器中的酒加热,让我品尝,加热后的清酒味道醇厚甘甜,与没有加热的果然味道不同。酒喝到一半时,藤井先生白净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,眼睛里也放出了光,话也多了起来。

藤井先生每年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之间,在许多中国的大学里作学术报告,在有的学校里做兼职教授。他说他到过中国大部分的省份,只有贵州等三个省份没有去过,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到贵州去看看,我想这可能与茅台酒有一定的关系吧。对于一个喜欢喝酒的人来说,茅台、赤水河、贵州总是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吸引力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
【逝者背影】

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书
——追忆吕曰生先生

□ 戴永夏

吕曰生先生仙逝已经一年了。每当重读他的作品时,好像他仍坐在我的面前,跟我娓娓谈心,对我谆谆教诲……

我是1979年秋天认识吕老师的。那时,他是《山东文艺》(《山东文学》的前身)的资深编辑,我则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业余作者。当我把一篇习作《荷花赋》寄给《山东文艺》后,在等待中迎来一个好消息:我的稿子准备刊用,约我到编辑部一谈。当我兴高采烈地来到《山东文艺》编辑部时,接待我的正是吕曰生老师。他面容和蔼,待人亲切。在简单问了一下我的创作情况后,便一一指出了我稿子中的缺点和不足,让我带回去再修改一下。几天后,我将改好的稿子送给他,他又仔细地进行了编辑加工,终于在1979年10月的《山东文艺》国庆专号上发表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型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,自然非常高兴。但由于受“杨朔模式”的影响,我的文章总拖着一个“光明的尾巴”。这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现象,我自己也不以为非,可是吕老师却及早地洞察到这一创作上的弊病。在此后的交谈中,他十分真诚地告诫我,写散文要抒真情、讲真话,不要图解政策、盲目跟风——

跟风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他还劝我多读书、多积累,不要赶时髦,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,多写点知识性散文,比如济南的泉湖山水名胜,就很值得写。

当时,吕老师已经是著名散文家,他的《骡子的故事》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。能遇上这样一位好老师,我自感很幸运。从那以后,我在创作上遇到问题,就常去向他请教。有了想写的题目,总爱先跟他谈谈,听取他的意见。每次,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听我讲完,然后从文章的立意、情节、结构甚至语言等方面,一一给我以指教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跟吕老师的交往更加密切,他对我帮助也更多。从交往中,我深切地感到,吕老师为人一身正气、情操高洁,尤其是他那秉持正义、刚正不阿、敢说真话的正直品格,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所在的济南出版社(当时叫济南出版办公室)在出版了宣传济南古代名士的《济南名士多》一书后,又计划编一本宣传近现代济南名士的书。为了遴选近现代济南名士,在济南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一个专家论证会,吕老师也应邀参加。会上,一些人仍以“阶级斗争”观点,无视历史事实,把非共产党人士排斥在“名士”之外。只有吕老师一人力排众议,仗义执言,大胆地提出:既然推选济南近代名士,就不应割断济南近代的历史。那些共产党的杰出人物固然是“名士”,而一些非共产党员却有突出贡献的人也应该算“济南名士”。他还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鞠思敏、王祝晨、宋还吾等人为例,他们对人类的进步事

业,对济南的教育、文化建设事业,都做出过重要贡献,在全国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和较高知名度。如果对他们的历史功绩视而不见,将他们排斥在“济南名士”之外,是很不公平的。他的这一大倡议,让在座的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,然而个别人却难以接受。果然,他刚一讲完,就遭到一位颇有点身份的作家的反对……

后来,尽管这本书没有编成,但事实证明吕老师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,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。他的仗义执言,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。

还有一次,我看他,见他桌子上正放着一本韩复榘的传记,话题便由这本书展开。他深有感触地说:这些年,出现了一股思潮。有些人写人物传记,不尊重历史,常将历史人物简单化、脸谱化,说好就一切都好,说坏就一切都坏。树一个人,就为他涂脂抹粉、隐恶扬善;批一个人,就对他百般指责、隐善扬恶。对此类恶习,他非常反感。他又以这本书为例,其中的许多内容,都是道听途说,把韩复榘写成一个头脑简单、有勇无谋、尽干坏事的鲁莽武夫,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他说,韩复榘虽是一个反动军阀,但并不是一无是处。他在主政山东时期,对山东的教育事业、经济建设以及惩治贪官污吏、禁烟禁毒等方面都做出过一定贡献。对待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,一定要历史地、全面地看待他,切忌简单化、片面化、庸俗化……为了客观、公正地评价这一历史人物,吕老师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,准备写一本比较真实的《韩复榘传》。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,这本书未能问世。但吕老师以尊重历

史、求真务实的精神,彰显了一个学者的尊严。

在治学上、创作上,吕老师硕果累累,有《雀喧集》、《泉城赏泉记》等多部著作问世;而在生活中,他又是一个富有爱心、情趣高雅的人,这从他对小动物的关爱中,可以略见一斑。他对宿舍院中的流浪猫,天天放水喂食;对房前屋后飞来的麻雀,总是爱护有加、精心喂养。他还把住处命名为“雀喧斋”,文集命名为《雀喧集》,对这些小生灵充满感情。平日里,他碰到身处危难的小动物,总是千方百计地救助。如他从顽皮孩子的乱石击杀中救出几只小刺猬,给它们做窝安家;从民工手里解救准备宰杀的大刺猬,让它在屋前安居,与自己为邻;还教育那些不懂事的孩子,要拒绝残忍,同情、怜悯这些弱小的生命……即使两只辛勤劳动的蜜蜂死了,他也伤心地将它们安葬于花下,“心中涌动的不只是怜悯,而且还有敬意……”在有的人看来,这未免有些“愚痴”,不值一哂,然而,他们哪里知道,这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应有的基本素养。诚如一位哲学家所言:一个善待动物的人,一定是一个有温情的人,一定是一个人性比较健康的人,一定是一个有情感底线的人,也一定是一个高尚的人。

如今,吕老师已经驾鹤西去。他生前曾留下遗言,连骨灰都不让保留,但却把最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,那就是寄托着他精神和生命的著作。记得老作家马识途曾说过:“我认为最好的纪念巴老的方法就是读他的书。”我想,这话用在吕老师身上,不也恰如其分吗?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编审)